

福建文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CC、中统 在闽内幕纪实

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C C、中统在闽内幕纪实

福建文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福州

责任编辑:黄小宁
封面设计:钟建东

主办单位 出版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3

定价:2.00元

编 者 的 话

CC是中国国民党内以蒋介石的亲信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个重要派系，它长期控制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及其党务活动，拥有很大的权势。

中统是CC掌握的一个特务组织，是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另一个是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听命于CC，进行各种特务活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革命运动；并对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进行遏制与瓦解，以维护蒋介石一派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

中统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5年，调查科扩组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1938年，党务调查处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1947年，中统局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5月，中央党员通讯局再变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不久之后，中统组织即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结束了它在大陆存在了20余年的罪恶历史。

CC和中统的关系至为密切，CC通过中统进行特务活动，在中统种种所作所为的背后，无不游荡着CC的黑影。但CC中人不一定参加中统，参加中统的人也不一定是CC分子。就福建的一般情况言，中统中人除高层人物和部分重要骨干兼有CC身份外，余人多不属CC。

本辑所收资料，皆系历史当事人或知情者就亲身经历或见闻所作的忆述。各篇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或主要回溯CC在

闽势力的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及其活动——控制各级党务、各种社团，将势力扩展于文化、教育、宣传乃至统计、盐务等各行政部门，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控制与操纵各类选举活动，以售其私；或主要记述中统在福建省党部建立前后的各个时期的组织机构与人事沿革，以及它在各个时期秉承CC意旨所进行的活动，并涉及它的外围组织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情况。资料翔实、具体，有较大的可信性，读者可藉此对CC、中统在闽活动的内幕有概略的了解，并加深对国民党政权反动本质的认识。

由于征集的资料有限，CC和中统的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在本辑中未能得到反映（如对有近10年历史的中统在闽领导机构——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的情况，就没有专文的记述），不无未窥全豹之憾。希望知情者能加以补充。

此外，由于各个作者当年所处的地位不同、所负的职责不同，记述中难免有不尽一致之处；即是同一作者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之所述，在不同文题之下亦出现某些细节上的差异。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本辑由吴修兼任主编，黄小宁任副主编，郑寿岩、张纪生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

目 录

闽省中统组织内幕知闻录	黄缘忻 (1)
中统控制的机关——福建省政府统计处	林涵宽 (20)
CC、中统在泉州活动概述	王酌聊 伍天佑 (38)
CC侵夺福建盐务	翁礼维 (57)
曹挺光的发迹和由此忆起的一些人和事	林涵宽 (65)
从二九会到胜利俱乐部	林涵宽 (91)
甲申俱乐部和胜利俱乐部纪略	林 忆 (134)
中统骨干陈枝华其人其事	林涵宽 (142)
主编“福建通讯社”的经历	陈衡铨 (148)
福建省国民通讯社	林涵宽 (161)
福建省国民党宣传机构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活动	林涵宽 (172)
附文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初期情况	林厚祺 (188)
略记福建的特务派系	何 震 (198)
中训团党政班毕业学员福州第一通讯小组的一次会议	原寿梓 (206)
更正	(210)

闽省中统组织内幕知闻录

黄 缘 析

我于1935年底在福州入“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所辖福建省特务室任密查员，开始特务工作；1945年一度担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永安区副区长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专员，于本省中统组织内幕多所知闻，兹扼要记述如下。

中统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政治组织，其具体任务虽未见明文，亦未听别人说过，但就我亲历亲见，大略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收集各种情报，主要是关于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力量活动的情报，凡有所获，即千方百计予以破坏、打击。兹举两例：

1944年上半年，永安区负责人张忠烈抓了国立音专（设于永安吉安）的一个学生，把他寄押于宪兵营营部，关了一些时间，张自己审问不出什么，约我帮审。张说他是共产党，在学校中组织读书会。我问读书会读些什么书，行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张都答不出，只含糊地说，参加者是在搞小集团，课外时间躲躲闪闪地活动。约在10天中，我陪张审问了三次，施以威胁利诱，终无结果。因无确实证据，亦无可奈何。张又把读书会的其他七八人叫来审问（地点在永安中山堂，上午由音专萧校长带来，下午问毕再交萧校长带回），问了一遍，也无结果。接着，张又把永安师范的两个浙江籍学生抓来，在永安城里某宪兵连连部内审问

（我也参加），其中一个说他童年时曾在家乡参加过新四军的儿童唱歌队，张如获至宝。但过数日张遇到我时，急跳着说：“那天晚上承认参加过新四军儿童唱歌队的学生，现在翻供不认了，其他情况更是什么都不说。”就在那一段时间，张还两次约我参加搜查公务员住宅，一次往一桥新村，一次往永安邮政局附近的一座楼房（只住着一对夫妇），亦毫无所获。上述的搜查和逮捕，张忠杰事先都没有办任何法律手续；凡抓来的人，都肯定是共产党，可是连嫌疑证据都拿不出，不过是“据人报告”而已。据执行逮捕师范学生的特务杨希贤说，他是根据眼线的报告直接到学生宿舍去抓的，没有通过校方。上面说的两次搜查行动，张也不过找了甲长一人同行。

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货币急剧贬值，如同废纸。那时，福建公教人员赖以维持残喘者，主要是食米一项（员每人每月150斤大米，工每人每月90斤大米）。到了三四月间，福建省府各厅处员工的食米还能照发，而附属机关（如学校和社教机关）则挂欠了，并扬言要减少。福州各附属机关的员工掀起了反饥饿斗争的浪潮，学生也上街游行支援。记得四月间一天，省立福州中学的训导主任石剑生到福州教育广播电台（社教机关之一，我任台长）找我说：福州省立各学校及社教机关教职员工联谊会决定，明日起全体罢工，提出清发积欠，维持和各厅处公务员平等待遇等要求。他要我们一起行动，并说罢工后未得通知，不得复工。石的态度很严肃，但我心里很奇怪：他这么一个中统特务（我知道他这个身份）怎么会出来领导这个运动？因当时我已好久未介入中统活动了，不便问他，只好将此疑问闷在心中。未料罢工只两天，积欠尚未发出，即通知复工了。据说是因为当局已口头答应了条件，员工为了学生的学业，决定暂先复工。至此我恍然有悟：一定是特务组织耍了花招，派石剑生伪装积极，篡夺了教职员工联谊会的领导权，继而藉此在短短

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群众性运动绞杀了。这种软刀子办法，是中统特务对待群众运动的惯用手段。

(二) 收集其他党派、团体及政治人物的动态等情报，视需要或打击之或联络之，在政治上搞阴谋，和他们争权夺利。这种狗咬狗之争，最常见的是和军统之间的争斗(以闽南地区尤烈)。此外，中统还介入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如在福建省出席国民党六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积极活动便是明显的例子(详见下述)。

(三) 发展组织，扩展耳目，增强反动力量。据我所知，福建的中统组织均在城市活动，成员都是机关、学校里的人，全是知识分子。在蒋海溶和我负责中统永安区时，重要的秘密文件都叫一个长期跟随我们的勤务送，虽如此，蒋和我也都没有叫他填表，把他吸收为成员，只是差遣使用而已。蒋海溶对于发展组织是个热心人，但他虽久在《中央日报》工作，报社内那么多技工，他也没有发展一个。总之，据我所知，福建中统组织发展的对象是公教人员及青年学生。

中统发展成员主要是用欺骗手段。当时，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多少知道有什么“兰衣社”、“CC”派等等的组织，一些公教人员为自己“前途发展”、“生活保障”，常有找这些组织做靠山的心态。中统做发展组织工作的人，就多钻这个空子。他们向这些人吹嘘自己的组织是某某关心培植的，是“哪里”领导的，中央和本省有哪些要人是属这个组织的，又是多么有力量，参加者多么有前途；等等。而后问他们要不要参加。其实，这一问也不过是形式而已，因为从对方的态度就可以明白，凡愿意听的，多不会感到这一套是在吹牛，就一定会答应参加的了。对青年学生则利用其天真，加以种种欺骗，有些人难免上当。如果同意参加组织，就要填表和宣誓，填了表，宣了誓，就算是正式的成员了。

以下分部分记述福建中统组织各时期的有关情况。

一、1938年福建省会迁永安前的情况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何时开始在福建建立组织，我不清楚，但据闻，还在1933年，就有这方面的人物在活动了。这一年，特务分子端木志、翁礼维和梁冠臣在福州被十九路军逮捕，后由国民党中央以蒋介石名义电令十九路军把他们送南京处理，自然这3人到南京就无事了。后来端木志担任中统头目徐恩曾的秘书。1934年“闽变”失败后，翁礼维和梁冠臣回到福州，翁在理工中学任教，梁在福建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的特务室内工作。1936年夏，在他们被捕的3周年“纪念日”，上司叫我在办事处大门口替他们拍纪念照。上述情况就是那时他们对我说的。

1934年秋，陈肇英到福州任国民党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在特派员办事处里设了个秘密部门，叫做“特务室”，它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闽组织的领导机构。特务室主任黄坚据闻原系中共党员，后叛变投入国民党，曾在张发奎部任过团长。他的对外名义是办事处秘书。室内工作人员约有10人，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管子才、何奋、梁冠臣、魏然、闵新吾、萨鸿、刘万倾等，但在办事处传达室的职员名牌上见不到他们的姓名。

1935年至1938年间的组织情况，据我所知，属特务室直接领导的有“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和密查员，另还有“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和“福建青年劳动服务社”。

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 这在当时是最低层的关系，但入社的手续规定得很繁：先由介绍人向组织提名，介绍某人情况，俟组织同意发展后，约定时间、地点，由组织派人和这人谈话（介绍人在场）；组织同意吸收了，由介绍人向组织拿登记表给这人填；经批准后，编入小组。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还要来个宣誓。所以有的人初参加时，会被弄得晕头晕脑，认为这么慎重，这组

织一定是了不起的了。但有时也有这样的现象：介绍某人入社，介绍人可以直接向特务室拿登记表和誓词，甚至不必说介绍的对象是谁，填好后送交室里就可以了。

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内分设小组，规定每周开一次小组会，时间2小时，内容有“学习三民主义”、“组织报告”、“情报报告”和小组长总结及上级参加人讲话等。

“学习三民主义”，参考的文件是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讨论题共有10多个。

“组织报告”是各人报告发展对象的计划及进行情况，如对象是谁，情况怎样，以及对其做了哪些工作等。

“情报报告”是各人报告所了解的社会上的党派活动、日本人和台籍人活动等政情和商情，以及官吏贪污等各种社会情况。

小组会的内容看来很多，但常开得不象样。参加者经常迟到和缺席，连上级参加人也如此。一个小组本来就没多少人（多的五六人，少的只有三人），所以常常开不成会；就是开得成，也因到会者拖拖拉拉，迟迟才开始。其次，在没有宣布开会前，倒是谈笑风生，宣布开会后，却都成了哑巴。所谓学习三民主义，不过就发下的讨论题，让一个人翻开《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找出答案，花三五分钟时间谈上一阵，就算完事了。所以成立时间长一些的小组，二三个月后，学习三民主义这一项，就勾销了。组织报告一项，也很少有人就发展工作提出报告。即有提出，也不过三言两语地作个简单介绍；但上级参加人却对之大加表扬，并嘱“继续努力做发展对象的工作”。下次会中，若上次报告的人再把会后自己如何做发展对象的工作吹上一通，就再受表扬。情报报告一项，不是全场沉寂，就是大谈吃喝穿戴和各种黄色新闻。我参加这种小组会约半年（开头是组员，后来当小组长），仅有一次听到一个人报告他所了解的党派活动情况。小组会尽管是这么一个开法，但上级参加人在讲话中，对小组会总是

表扬的，从来没听过一次批评。所以所谓小组会，开头几次还略有开会的样子，到后来就变成像在茶摊摆龙门阵一样了。

福州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是省特务室直接领导的。由组织所派和发展对象谈话的以及小组开会时前来参加的，都是当时在特务室内工作的人。

这个社具有某种训练班的性质，组织这个社，目的是训练初参加者做发展组织的工作和学习搞情报活动的技术。如小组成立初期，上级参加人在小组会的讲话里，首先提到的是保密问题：对外不要暴露自己的关系身份，在小组会内听到的不可对外人说；发展组织和了解各种情况时要沉着镇静，不露神色等。有人提到做发展工作有困难，一是不知怎么找对象，二是不知怎样开口，上级参加人就启发说：对象可以在亲朋戚友中找，要在人多的场合去接近他们，和他们聊天，趁机谈些“总裁伟大”之类的话，看对方反应如何。他还以搞恋爱为比喻，说对发展对象要多做工作，要有耐心等。小组会上对于情报一项出现冷场时，参加人就鼓励大家：“不管什么生活琐事都可说，有的看来是小事，深入研究一下，结果是个大事”。一次开小组会时，大家在闲扯中提到手枪，参加人说“下次就和你们谈手枪使用”。下一次开会时，他真的带来两支手枪（一把左轮，一把曲九），还说他以前在上海租界，有一次身上带枪，恰好遇到“抄把子”，他怎样地把枪藏在腋下混过了关。接着就教大家怎样拆装手枪、单手上子弹和夺枪等。一个小组的上级参加人是不固定的，时常更换。他们似乎具有教员的身份。一些原参加小组活动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如果被介绍去参加别的关系，就不参加小组会了。

密查员 具有这身份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在福州、密查员也是由省特务室直接领导的，参加时只填一张表并在誓词上盖章。根据需要或请求，会发给一本蓝布硬皮的“特务证”。证里有姓名、籍贯、年龄、性别、关系和携带枪支的号码等栏目，并

注明有效时间，还载有“为了办案临时需要，持证人可就近调动宪警协助”等条文。铃盖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大印。我在担任密查员后，还领到一本署名为“蒋中正”的名为《游击战术》的小册子。

密查员没有分小组，没有横的关系。我担任密查员两三年间，虽人在福州，特务室却没有对我布置过什么任务。1937年下半年，我到厦门集美教书，因人地生疏，请求移转关系。由黄坚以私人名义，写一封介绍信给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长陈联芬；后又由陈联芬写一介绍信给集美学校校董室主任叶维奏，信内没有提到我的组织关系，就像介绍朋友一样。以后我转到三都中学（先设在宁德城里，后迁福安），再后又转到沙县、三元、永安等地任教，因没有请求移转关系，便和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

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 该组织的成员是社会上有政治地位的中层以上的分子，参加时也要填表和填誓词，分小组活动。一个小组的人数较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多些（约有10人），组长由上一级成员兼。我所在的福州市第二小组成员，记得有管子才（组长）、赵钜恩、何奋、江兆仁、翁礼璇、郑由端、颜学回等。小组会也是每星期一次，每次2小时，开会时都要读誓词。每人发给一本陈立夫著的《唯生论》，开会时除讨论组长交下的问题外，就是讨论《唯生论》。

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这个组织是全国性的，在福州建有市级组织，其成员据所知有管子才、翁礼维、蒋海溶3人。我所在的那个小组成员中，有的人当时是在特务室内工作的，可见该组织和特务室是血脉相通的，但它又不归特务室领导，那就应该另有所属了。

据闻当时中统在组织方面分有特工和政工两个部门。特工部门是搞情报和各种见不得人的罪恶行动的，政工部门则是在政治舞台及社会各部门搞争权夺利活动的。但在成员方面，很多是两个部门都参加，没有固定在哪个部门。

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是政工部门的组织，这个组织在1937年8月间内部宣布解散，说是为实践“关于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以利国共合作”的诺言。其实它的解散和复兴社等组织解散一样，是骗人的把戏。当时特工部门中如密查员关系等，据黄坚说，不仅没有解散，还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1934年至1938年间，在福州（也可说在福建）的中统大头目，除黄坚外，还有福建省反省院院长赵伟民和福建省广播电台台长黄天如。

福建青年劳动服务社 这是一个外围组织，社址在福州吉庇巷国民党闽侯县党部内。这个社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林炳康发起的。1935年，林到福建省党部任职。他的政治野心很大，想以建立组织的形式培植个人势力，作为政治活动的资本，因之来到福建不久，就发起组织这个社。他拉了在福州各中学任教的旧友（以便此后拉学生做社员）及一些中统分子做发起人，如省立福州中学训育主任金树荣、省立理工中学教员翁礼维、省立福州师范教员黄缘析、省立福州职业学校教员刘崇元、三民中学教员曹挺光、英华中学初中部主任陈云章、省立民教馆部主任李学龙和闽侯县职业学校校长宋孝颖（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等都是发起人。筹备约3个月，登记社员近300人（后发展至400人左右），于是开成立会，选出理事、干事。选举完全由林炳康一手圈定布置。选举的结果是：林炳康、黄缘析、方正平3人当选为常务理事（方当时是省党部组织科长，不属中统关系，但因他是陈肇英外甥，要利用他和陈打交道，所以给他挂了个常务理事），李雄、金树荣、陈云章、翁礼维、曹挺光、宋孝颖、李学龙等十一人当选为理事（李雄当时是省党务特派员办公室秘书，不属中统关系，选他是为了利用他和陈肇英打交道并取得公文方面的方便），蒋海溶当选为常务干事（林炳康让蒋充当实际负责人），刘崇元、江兆仁、郑由端、魏然、周峰等八九人当选为干事。从

这理干事阵容中，可以看出这个社是完全受特务分子控制的。

由于林炳康多方奔走，该社成立后得到了省政府和省党部两方面的每月固定津贴，合计约100元，因之能够雇用一个办事员和一个勤务。

该社成立后，举办了一些适应青年兴趣爱好的活动（如办国术班、歌咏班、组织远足及演戏等），在社会上也做了一些好事（如办冬赈、小本无息借贷、水灾救济等），还办了民众夜校。七七事变后，也搞了些抗日救亡活动（如组织救护队，捐献废铜烂铁，搞义卖，以及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等）。该社搞这些活动，实质上是以此为手段，把青年吸引到自己周围加以毒害，继而拉他们入伙。虽然该社社员不算是中统组织的成员（中统组织也没有承认该社社员是它的成员），但因该社的理干事绝大多数是中统分子，故尽管很多人是糊里糊涂地入社的（该社社员绝大多数未被介绍参加特务组织），也总是被人认为沾上特务的边了。

1939年，福州大多数机关、学校已内迁完毕，社员散了，这个社也就无形解散了。

二、省会迁永安后的情况

（一）组织、人事

1942年我的工作地点移到临时省会永安，适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已由连城迁到永安下岭，于是我再度和中统组织有了接触。这时福建中统组织的领导机构已改名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调统室”）”，也在下岭。调统室主任是赖文清，室内工作人员约有20人，我只认识其中的林鸣岗（秘书）、陈兰华（科长）、张忠杰（科长）、闵新吾等几人。特务证件也不叫“特务证”了，改名为“调查证”。

调统室内除设秘书外，分有总务、组织、情报、宣传、特情、行动几个科。另外还有一个无线电台，台址在永安北门外龟山，台长为章元模（另有报务员等共五六人），有二三部发报机，最大的一部（短波，100瓦）专用于与重庆通报。

这时期，中统组织关系的名称有通讯员、党员通讯网、调查员三种。通讯员是社会地位较一般的（如中学生，介绍参加时，就给填这种关系表）；社会地位较高的，吸收时便介绍参加党员通讯网。一般都是这两种关系。在特务组织内部看，这两种关系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区别，参加时填的表都只有一张，并同样在一张誓词上盖章。至于调查员，这是最内层的关系（自然不敢说没有更核心的内层），简称“调工”，只有那些和组织有长久的历史关系并被确认为“可靠”的角色，才会被批准吸收。调查员所填的表很讲究，16开厚道林纸排印，多至三四张，栏目甚多，涉及家庭情况、祖宗三代和个人全部经历，还要写上详细自传。一式要填两份，各贴一张一寸的免冠半身照片（所以要两份，我想有一份是要呈报中央的）。在中统内部，调查员的人数不多。

调统室下设有区一级机构。当时福建省内设区的地方有永安、福州、厦门、莆田、福安等处。每区编制员额（就是领有薪水和米粮的）一般是一至两个（1945年上半年永安区有3个员额，算是特别的）。区的负责人叫“区长”，对外名义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专员（有福建省党部签印的派令）。当时，以厦门尚未收复，设在漳州、厦门的区备有电台，较别的区多了台长和摇工两个名额。

1942年我到永安时，永安区负责人是马凯旋，1943年底改由调统室科长张忠杰兼。1945年1月起由蒋海溶（蒋当时是福建《中央日报》社经理）和我两人负责（后我于是年8月离开永安，蒋于10月离开）。

永安区在马凯旋负责期间，办公地点就在他的家里（地名忘

了），听说他在省立永安中学抓过学生。张忠杰负责期间，办公地点在县商会；除上文说过的逮捕学生和搜查公务员住宅的行动外，听说他在省农林处也有过动作。1945年上半年蒋海溶和我负责期间，办公地点设在北门附近的一个酱油厂内（地名忘了，只记得出大门后顺一条马路往下走，就到了龟山）。这酱油厂是陈枝华、蒋海溶等合股经营的，蒋海溶家也住在里面。

永安区内部名义上也分几股，蒋兼特情，我兼组织（出席每月举行一次的永安县特种会报会议），林时聘（时任福建《中央日报》社人事室主任，原属军统）任情报，陈新民（时任福建省政干团体育教官）任行动，薛麟书（时任福建广播电台编辑，为该台台长薛敦平之弟）任宣传，陈静征（蒋海溶小老婆）任总务。我还就永安籍的关系人中选择一些较有地位的（如县参议员林成龙及镇长、小学校长等约十一二人），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小组作为核心小组，派林成龙任组长。

我虽任永安区负责人，但不知在永安的中统分子的确切数目，只是从区的花名册上看到，大约有五六十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永安人（仅记得林成龙是其中的一个）。非永安籍的，除了上述我们几个骨干外，只有丁重宣、陈若冰、杨希贤、黄耕苍、康幼亮、蒋道、郑由端、庄雪白等十几个。花名册中，省调统室里的人全部不列入。此外，还有好些据我所知是属中统的人，也未列入，如黄坚、薛敦平、徐箴（时任省教育厅厅长）、曹挺光（时任省党部宣传处处长）、郑杰民（时任省社会处处长）、赵钜恩（时任省地政局局长）、叶维泰（时任省教育厅科长）和张忍、陈尔浚、林荫南等。原因是：他们或是与中统局或省调统室有直接关系，不宜列在区名册中；或是原是在其他方面参加组织而又未办理移转手续，自然也不能列名了。

1943年新调到永安的福建广播电台台长薛敦平（调来前在重庆中统局报务部门工作）是个老牌特务，他来福建时，中统局还